

歷史

历史转折的文化动因探析

LISHI ZHUANZHE DE WENHUA DONGYIN TANXI

颜景高 著



文化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历史转折的文化动因探析

LISHI ZHUANZHE DE WENHUA DONGYIN TANXI

颜景高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转折的文化动因探析/颜景高著.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209-06976-2

I. ①历… II. ①颜… III. ①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IV. ①B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12561 号

责任编辑: 隋小山

封面设计: 张 晋

历史转折的文化动因探析

颜景高 著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 (0531) 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莱芜市华立印务有限公司印装

规 格 16 开 (169mm × 239mm)

印 张 14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6976-2

定 价 2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 电话:(0634)6216033

前 言

唯物史观既认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同时也认可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尤其是在历史发展的“特殊时刻”——历史转折期。历史转折意味着人类生存范式的转换，指证着精神变革力对社会转型的强大推动作用。作为引领社会发展、历史变革的灵魂和内在动力，文化体现了静态的观念系统和动态的能动力量的双重统一；作为新旧社会被解码和重新编码的工具，文化是构建新的意义世界的精神“脚手架”。历史转折的文化动因集中反映在四个方面：（1）人类诗性智慧的高峰期创造，为历史大翻转注入了直击旧世界的激情、冲力与意志；（2）文化启蒙的思想闪电，有助于震荡并颠覆传统社会的精神结构；（3）萦怀忧患意识的文化精英群体，是推进新旧文明交替的卡理斯玛人物；（4）代表历史大趋势的先进文化，为历史大变革提供了社会进步的标尺和动力。通过对经典文本的研读、史实材料的掌握以及当代文献的挖掘，本文解读了文化因素在历史转折点的反作用，尤其是剖析了超越意识、批判精神、忧患意识以及和谐价值观在历史大变革时期的牵引力。

首先，作为人性情感的内在燃烧、生命之流的精神创造，感觉文化乃是人类超越性创造的本真显现，更是人类“悲剧”意识的觉悟澄明。需要澄清的是，悲剧并不是单纯的灾难、痛苦或者毁灭，而是历史变革、社会转型和文明交替的鲜明信号；历史个体对灾难的自觉对抗，并不是出于一时激情的意愤，而是自我超越精神的彰显，历史主体由之可以挣脱原型社会陈规陋习的羁绊，完成“凤凰涅槃”式的浴火重生，这鲜明地体现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历史变革时期。需要注意的是颓废意识对人生精神价值追求的消

解。

其次，作为“文化启蒙”运动的旗帜，“理性”指认着一种科学的态度、一种反思的精神以及一种“经久不断的批判”，这解构着传统社会僵化思想的钳制，塑造着现代社会所宣扬的自由、自主和自我决定的“个人向度”，“启蒙”由之规划了“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性”、“用勇气重新创造一个自己”的现代性图景。启蒙运动所拥有的新工具论的科学主义方法、理性的怀疑主义精神、天赋人权的自由理念以及思想解放、与时俱进的旗帜，为现代文明制度的构建注入了传统的非连续性、主体性的转向、纯粹理性的依赖、控制和操纵自然等重要的价值预设；文化启蒙思想通过政论性散文、小说化了的哲学文章等文化形式，传播着自由、真理、道德、进步、平等、民主与科学等现代性观念，呼吁着现代文明社会的来临。吊诡的是，启蒙思想家所信赖的“理性工具”日益蜕变为“目的”，生成的却是“经济性”价值观，留下的是笼罩整个欧洲社会的虚无主义。

第三，作为瓦解传统规则、惯例和习俗的革命性力量，卡里斯玛具备英雄性的领袖气质并日益彰显出类似于神迹的启示，他们由而具有了改变他人“心神变化”和“心理取向”的巨大感召力，这源自于卡里斯玛所萦怀的洞悉历史穿透力的忧患意识，即流淌在“卡里斯玛式”人物血液中的一种活力、一种素质、一种生命之流的冲动。卡里斯玛所拥有的“事变创造”的力量，往往出现在历史大变革时期。卡里斯玛裂变后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反权威主义”的民主型法制社会尤其值得期待。悖论的是，卡里斯玛裂变本身所蕴含的祝福意识膨胀却会内在消解其历史使命感的召唤，特别是在历史大变革后的“和平和建设”时期，一个政党因而需要抵制“祝福”意识的侵蚀，并逐步实现党员意识由革命时期大无畏地“献身”向建设时期成为“行业模范”的精神转向。

作为社会主导价值观的“理想类型”之一，“集体主义”价值观在整合社会力量方面优势明显，但其对人性的杀伤、对自由的羁绊以及对社会活力的消解清晰可见；“个人”价值观有着一套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的支撑，并逐步成为西方社会的精神导向，这激活了现代社会的个人创新能力，却膨胀

了“外在”法制难以约束的人性欲求；“超越自我”的价值观导向在“后现代社会”日益发育，这体现在日益彰显的“体验经济”形态之中。面对当代社会中“个人与他者”自由发展的悖论，代表历史大趋势的先进文化注重时代维度的“历史化”、价值维度的“进步化”、消费维度的“大众化”以及内在品格的“科学化”，形成了引领社会进步的核心价值观。先进文化对“人与社会”关系和谐的追求，将会逐渐形成导向“自我实现”的良性社会氛围，尤其是在当下的知识经济时代，先进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导向愈发彰显出人类走向自由和进步的可行路径。

于是，我们发现，“历史的演化创新愈来愈取决于历史主体对客观实践进程的自觉把握！”因而，对历史主体自身认知的深化十分必要，尤其在当下智能化时代人类本身架构社会发展的精神变革力愈来愈突显的时期。从文化的角度解剖历史转折，可以从宏观上把握人类社会的实践进程，透视人类历史的未来发展方向。我们可以把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大体划分为三大形态，即马克思所言说的“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形态以及未来的“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人联合体。人类个体经历了由依附状态逐步走向个性自由的历史进程，这集中表征为文化的生成，因为人类生活的基础不是自然的恩赐，而是文化形成的习惯，没有纯粹自然的人，人总是生活在文化之中。更重要的是，当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发生重大转折时，人们总会鲜明地感受到原型社会旧文化的无形阻碍和黏滞，以及新文化精神的强大号召力和推动力。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革，以及从现代社会向未来自由人联合体的过渡，离不开对人类自身的精神底层——文化的剖析。

从社会现实层面上说，中国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历史大过渡，三十年改革开始的现代化建设既创造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奇迹”，又浓缩了西方近三百年工业革命的“症状”。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本身的持续推进就离不开现代社会文明秩序的内在支撑，也离不开先进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指引，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开拓，前无古人，这亟须我们具备自我超越精神、社会批判意识、社会忧患意识以及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另一方面，

作为“现代化”经济建设（以释放个人欲求为起点）的副产品，颓废意识、虚无主义、庸俗心态以及娱乐心态等等，在消解着社会生活的精神意义，曾经的神圣感和英雄维度也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人们所曾经向往的自由似乎蜕变为个人欲求释放的肆意和冷漠，这迫使我们去寻找人类价值失落的文化根源。重要的是，我们仍旧生活在传统文化的链条之中，习俗和惯例仍旧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不管是摆脱传统的羁绊，还是在传统中寻找重生的力量，我们都应该剖析民族传统、拥抱先进文化。

目 录

前言	1
导论	1
第一章 历史转折范畴	12
第一节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阐释	12
第二节 历史发展的特殊时期：社会意识对社会 存在的反作用	15
第三节 历史转折：历史主体创造性彰显的时期	18
一、历史转折：特定社会生产力进入质向飞跃的时期	18
二、精神变革力在历史转折中的作用	24
三、文化：精神变革力的载体	27
第二章 文化动因（1）：诗性智慧与历史直觉	32
第一节 感性文化的实质	32
一、人性情感的内在燃烧	32
二、勇于超越的悲剧精神	35
三、激情、意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原理释义	39
第二节 人类的诗性智慧对传统社会的批判	42
一、文艺复兴对欧洲“黑暗时代”的鞭答	42
二、“五四新文化”对旧中国“封建礼教”的控诉	50

三、新时期“伤感文学”对时代新精神的呼唤	58
第三节 文化动因的衰减：颓废意识的解构	64
一、“颓废”意识的特征	64
二、“颓废”意识对社会精神的侵蚀	67
第三章 文化动因 (2)：思想启蒙与批判意识	71
第一节 思想启蒙的本质	71
一、“用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71
二、自我批判意识的一再呈现	74
三、个人向度的内在生成	77
第二节 历史事件与思想启蒙运动	79
一、英国“光荣革命”与思想启蒙运动	79
二、法国“大革命”与思想启蒙运动	82
三、德国“渐进式改革”与思想启蒙运动	85
四、中国“现代化事业”与思想启蒙运动	87
第三节 历史的虚无性：思想启蒙的缺憾	91
一、虚无：“自我膨胀”的极端化症候	91
二、虚无性：追求“效用”的现代性后果	93
三、虚无主义的趋向与启蒙精神的再思考	96
第四章 文化动因 (3)：卡理斯玛与忧患意识	104
第一节 唯物史观视域中的历史发展动力剖析	104
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	104
二、普通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106
三、杰出人物在历史转折点的作用	108
第二节 卡理斯玛与忧患意识概述	110
一、卡理斯玛的概念界定	110
二、忧患意识的概念界定	113
第三节 历史性事变和卡理斯玛人格	114

一、“十月革命”离不开列宁所特有的洞察力	114
二、“改革开放”事业彰显出邓小平所持有的 忧患意识和党员意识	117
第四节 卡理斯玛裂变与党员意识的嬗变	131
一、卡理斯玛裂变的可行路径分析	131
二、后卡理斯玛时代：党员意识的持有和转向	137
第五章 文化动因（4）：先进文化与核心价值观	140
第一节 社会主导价值观的“理想类型”评述	140
一、传统社会中“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辉煌面和问题	140
二、现代社会中“个人”价值观的文明面和危机	143
三、符号化生存世界的境况和追问	158
四、后现代社会中“超越自我”的价值观导向及其意义	166
第二节 先进文化核心价值观对社会发展方向的引领	176
一、先进文化核心价值观探源	176
二、先进文化核心价值观对“人和社会”关系和谐的追求 ...	179
三、先进文化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导向功能剖析	182
四、先进文化核心价值观对知识经济时代 主流价值观的引领	196
参考文献	203
后记	213

导 论

一、研究现状分析

从已有的文献资料来看，把历史和文化结合在一起研究的论著或文章比较多，特别是自文艺复兴时代以来，许多学者对历史和文化的关系集中进行了阐述和论证；但相对来说，把历史转折作为研究对象的论著或文章则少得多，从文化视角透析历史转折的论著或文章更是凤毛麟角。欣喜的是，许多学者从自己学术的研究角度出发，对历史转折和文化动因的内在勾连提出了天才的见解。

（一）国外研究现状

德国哲学家、文学评论家、历史学者及信义会神学家赫尔德认为历史在变革中前行，并且人们应该大无畏的推进历史变革，国家更应该导引历史变革的方向。他说：“革命——人们把它们想象为全部的变革……永远不知不觉地、静悄悄地、更强有力地进行革命，没有它们，就没有世界、没有人类。因此，国家不应当非常怕它们，而应当支配它们，应当把它们看做是MOTUS PERISTALTIKUS，应当预见到它们并在它们的发展停滞不前的地方鼓励其发展。”^① 德国哲学家康德则认为，人类社会总是在历史发展的“中断”中不断前行，认可历史“转折点”的价值，并且隐隐约约地预见到人类在历史转折中的担当，他说：“人类完成其全部天职的历程，看来就是不停地中断，”历史总会“遇到转折点（PUNCTUM FLEXUS CONTRARIJ）。”^②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强调，历史在“中断”中走向更光明的未来，这是历史发展的规

① 阿·符·古留加：《赫尔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93—94 页。

② 康德：《历史批判文集》，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70、150 页。

律，更是历史再造和重生的源泉，黑格尔认可人类在历史转折中的特有禀赋和能力，他说：“在世界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重要时期，在那些时期中，这种发展似乎是遭受到了‘中断’”，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继续不断地发展。”^①“人类的使命中，我们无时不发现那同一的稳定特性，而一切变化都归于这个特性；这便是，一种真正的变化的能力，而且是一种达到更完善的能力——一种‘尽善尽美性’的冲动。”比利时耗散结构理论创立者、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伊利亚·普里戈金认定，从耗散理论的观点印证了历史发展是人类社会一次次的再创造、一次次的重生，他说：“我们所生活的地球和能让我们生存的真理——都变得有生机起来。每一次我们听到的都不是死亡的回声，不是宣告逝去的钟声，而是人类和物质性再生和重新开始的声音，是在它们短暂的永恒中重新固定一瞬的声音。”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更清晰地指证历史中的“运动、转变和变革”，他说：“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我们关注更多的是运动、转变和联系，而不是什么在运动、转变和联系。”^②

从文化的视角理解历史的最初萌芽是与意大利哲学家维柯的名字连在一起的。1725年，维柯发表《论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标志着文化进入了历史哲学研究的视野。他在该书中提出：历史是人创造的，人创造历史的过程就是民政世界形成的过程，或者说是语言、宗教、习惯、制度、生活方式、法律、政府等体系形成的过程，所谓历史其实就是文化史。从维柯使用的文化概念来看，他把文化做了广义的理解，即文化是人所创造的一切，虽然这一文化概念过于宽泛，但毕竟从此开始，习惯、风俗、生活方式等内容成为考察历史的重要尺度，而且对历史的分析从经济、政治等单一的领域转向了整体研究，这些都是维柯对历史研究的重大贡献。之后，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赫尔德使用了“民族精神”这个概念，根据其对此概念的使用，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生活在一个特殊团体中的人因其种族、地理条件、历史传统、共同的文学和艺术而形成的并代代遗传的某种集体精神。赫尔德从民族精神出发，着眼于人类文化的特殊性，研究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这是人类从文化的视角研究人、研究社会、研究历史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① 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译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56年版，第96、9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9、417页。

斯宾格勒与汤因比，更加系统地考察了文化与历史发展的关系，深刻论述了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他们反对传统的历史研究对象，反对把政治国家及其政治形态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也反对孤立地从政治或经济的视角研究人类社会历史，而是采用文化形态学的方法，把世界历史归结为文化形态的发展史。斯宾格勒首开了“文化形态学”的先河，他认为文化形态学就是研究各种文化有机体所经历的整个生命历程。他说：“世界历史就是各伟大文化的历史，人类的历史没有任何意义，深奥的意义仅寓于个别文化的生活历程中。”他认为全人类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只有各个文化的历史，世界历史有八种自成体系的伟大文化（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古典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玛雅文化、西方文化），其中每种文化都是一个有机体。要研究这种由各个文化组成的世界历史，必须采用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新的研究方法，他称之为“文化形态学”的方法，即“把一种文化的各个部门的表现形式内在地联系起来的形态关系”予以考察和理解，文化形态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文化有机体。他认为，文化就是活生生的有机体，代表着生长和创造，文化从根本上说是活的精神。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与一般的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研究有所不同，他不是描绘历史上出现的重大事件，而是把文明作为历史运行的基本单位。这一方法是对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提出的文化形态学研究的继承，但他又克服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学的不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特色。汤因比反对把民族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而认为历史研究的单位是文明。他说：“历史研究的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单位既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不是另一极端上的人类全体，而是我们称之为社会的某一群人类。某一群人类就是一个社会或一个文明。”从汤因比对文明概念的使用来看，与斯宾格勒的文化概念有着大致相同的含义，在他看来，不同的文明形态包含着不同的文化精神，文明形态的命运与其本身的文化精神密切相关，文化精神从深层制约着文明形态的发展和人们的命运。在《文明经受着考验》一书中，他更明确地指出：“从文明的角度，而不是从国家的角度去考察历史，把国家仅仅看做是文明的生命中相当次要的和短暂的政治现象的原因。国家正是在文明的怀抱中诞生和消亡。”斯宾格勒、汤因比都不赞成从民族国家、政治及重大事件去理解历史的变迁，主张从文化的视角来把握极为复杂的历史变化，这是历史变革理论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转变。从此开始，人们对关系到

自身命运的历史变革的研究不再停留在表层的政治或经济，而是深入到历史的内部结构——文化领域中去挖掘，这标志着人们关于历史发展的认识有了实质性的提高，也预示着历史发展的进程进入了更加自觉的阶段。

从文化领域考察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在雅斯贝尔斯的历史哲学中也有所体现，他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即史前时代、古代文明、轴心期和科技时代，其划分的根据与标准不再单单是经济、政治，而是根据文化，根据人的发展，他说：“人类整体是一个生命发展进程。它成长，旺盛，衰老，死亡。我们不仅把它描绘成人类独一无二的发展进程，而且也把它描绘成人类文化相互接替和彼此共存的重复而多样的发展进程。文化是历史的躯体，它从蒙昧的人类杂乱无章的原材料中生长出来，其进程服从于各项法则，有生命的各阶段，有开端和终结。”

雅斯贝尔斯认为，轴心期在人类历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原因在于这一时期奠定了历史进程的三大主要精神（西方精神、中国精神和印度精神），正是三种不同的文化精神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文化模式和三种不同的社会发展。与此同时，雅斯贝尔斯还把历史划分为史前、历史和世界历史三个阶段，划分的标准主要着眼于人的生存状态，在他看来，史前人们处于一种自发的生存状态，在历史阶段人类试图超越自身，但是由于文化发展的缓慢和有限，致使人们并没有完全摆脱自发的生存状态，到了世界历史时期，由于交往的扩大和技术的发展，人类逐渐由自发的文化状态转变为自觉的文化状态，人类的文化精神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这样，雅斯贝尔斯的历史哲学就突出了人及文化的地位，改变了以往历史哲学对人及文化的忽视，从而把历史还给了人，把历史还给了文化。

文化在历史发展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文化精神的转变促使历史转折的发生，这一点不仅得到了历史哲学的关注，也受到了社会学家的重视。透过韦伯的论述，文化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关系清晰地呈现在眼前。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通过对西方社会从中世纪转向资本主义的研究，极有力地说明文化精神与社会转型的内在关系。他认为，新教加尔文教义促进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兴盛，这个教义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确认了得救预定论并有所改革。按照得救预定论，人不能靠信仰和行为得救，能否得救是从每个人出生就预定了的，无论什么东西都改变不了一个人的命运。可是这样一个信念却是宿命论的态度。于是加尔文新教对此做了一

个新的解释，教义认为，善是上帝可能选择的迹象，人人都可能被选中，但唯一理智的假定是，大多数被选中的人会通过自己的性格和行为表现出他们心灵的品质和命运的性质，这种含蓄的确认有力地鼓励了恰当思想和行为，原来的预定得救论转换成了一种世俗的行为准则：勤奋、诚实、认真、节省金钱和时间，结果使神召同世俗职业建立起某种联系。按照韦伯的解释，新教教义造就了新型实业家，他们致力于按一定方式生活和工作，重要的是这种方式，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按照理性、勤奋、刻苦、禁欲、讲实效、重效率的方式工作，使获利活动获得了合法性，还没有出现浪费。“这个世俗禁欲主义强烈反对财产的自发享受：它限制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另一方面，它具有使自由获取行动摆脱传统主义伦理盘诘的心理效果。它打破了对所谓获取冲动的束缚，不仅使其合法化，而且将其视为上帝的直接意愿。”这就是韦伯所阐发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在这个论述中，他敏锐地觉察到了资本主义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文化基础，指出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没有加尔文对预定得救论的重新解释，就没有资本主义精神，当然资本主义社会也就难以产生，现代社会取代传统社会的转型过程可能就不会在那个时期发生。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精神的确立在西方现代社会转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从文化概念的理解上来看，差异是很大的，克鲁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评论》一书中，归纳和总结了一百多种关于文化的定义。实际上，西方早期关于文化的界定来源于英文 culture（拉丁文为 cultura），通常指“耕耘”或“耕种土地”。在十八世纪的法国，文化演变为训练和修炼心智、思想和情趣的结果和状态，特指良好的风度、文学、科学和艺术。到了十九世纪，文化取得了现代的意义，许多国家在文明、文化基本同义的维度上来进行分析和研究。需要注意的是，囿于西方特有的宗教意蕴，清教徒在某种神圣的意义上来体悟文化的概念，如“精神耕耘”（mental culture）或“智力耕耘”（intellectual culture）。随着文化化学研究和人类学研究的深入，文化的内涵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特点，比较有代表性的文化概念主要有：

第一，文化是一种活生生的有机体。这是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向我们展示的一种基于深刻的感悟而形成的文化印象，他说：“我看到的是一群伟大文化组成的喜剧，其中每一种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从它的

土生土壤中勃兴起来，都在它的整个生活期中坚实地和那土生土壤联系着；每一种文化都把自己的影像印在它的材料、即它的人类身上；每一种文化各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生活、愿望和感情，自己的死亡。……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自我表现的新的可能，从发生到成熟，再到衰落，永不复返。……我把世界历史看成一副无止境地形成、无止境地变化的图景，看成一副有机形式惊人地盈亏相继的图景。”^①他强调即真正的文化具有内在的生命力，它通过自身的盛衰变革推动历史的演变。第二，文化是人的第二自然。这种文化概念强调文化不同于自然和本能的“人为的”的特征，即突显人的创造性和自由，文化使人既超越自然，又补充着人的自然。哲学人类学家蓝德曼说：“文化是人类的‘第二天性’。每一个人必须首先进入这个文化，必须学习并吸收文化。”第三，文化是一种关于人的本质的符号体系。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认为，人的存在具有特殊性，这表现在人的特有的活动的功能性，所以，应该从根本的“劳动”来理解人、理解人所特有的文化符号，他说：“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周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因此，一种‘人的哲学’一定是这样一种哲学：它能使我们洞见哲学人类活动各自的基本结构，同时又能使我们把这些活动理解为一个有机整体。”^②以上三种关于文化的界定，是将文化与人的特质联系在一起的，认定文化体现了人的创造性、自觉性和自由。也就是说，文化是人的属性，是人之为人的显现，从而将人的创造性和社会属性突显出来。第四，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总称。这是英国文化人类学家关于文化的典型定义，认为文化是人类生活方式的总和，他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③这意味着文化和文明的近似通约。第五，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或模式，提出文化模式研究的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认为，文化在本质上是趋于整合的，并赋予个体的行为以意义。她说：“文化行为同样是趋于整个的。

①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上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39 页。

② 卡西尔：《人论》，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1 页。

③ 泰勒：《原始文化》，中译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 页。

一种文化就如一个人，是一种或多或少一贯的思想和行动的模式。”^①但实际上，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模式的最终指向，文化会最终形成一种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这是文化的特质所在。第六，文化是一种给定的和自在的行为规范体系。这种概念因而特别强调文化的整合力，认为文化就是在历史积淀中形成某种统一的行为规范，美国学者巴格比在《文化：历史的投影》一书中说：“文明应该期望文化能表明它是某种规则，而这已被证明确实如此。现在，可以用如下的话完成我们的定义：‘文化’，就是社会成员的内在的和外在的行为规则，但是剔除那些在起始时已明显地属于遗传的行为规则。”^②

最后，文化是一种自觉的精神和价值体系。美国学者亨廷顿在《文化的重要作用》一书中指出，“‘文化’一词，在不同的学科和不同的背景之下，自然有着多重的含义。它常常用来指一个社会的知识、音乐、艺术和文学成品，即社会的‘高文化’。有些人类学家，尤其是克利福德·格尔茨，强调文化具有‘深厚意蕴’，用它来指一个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包括它的价值观、习俗、象征、体制及人际关系等等。然而，在本书中，我们关心的是文化如何影响社会发展；文化若是无所不包，就什么也说明不了了。因此，我们是从纯主观的角度界定文化的定义，指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如此可见，可以将文化划分为三种“理想类型”，其一，高级文化，即通常所说的高雅文化，这提供了文化划分的标准和规范；其二，文化样态，即通常所说的文化无所不在，这说出了文化的经验事实；其三，主观文化，即通常所说的人类所特有的精神态度和价值取向，这彰显了人类自身在历史进程中的变革，也是本文中所采用的“文化”的大体内涵。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历史转折的界定，首推上海财经大学张雄教授的创新性探索，他认为历史转折是历史主体实践活动方式的整体性、根本性的演化创新的变革趋势，历史转折意味着人类实践活动方式的变革；社会转型是实践主体自觉推进历史转折的历史创造活动，这突出了实践主体在历史转折中的主动地位、能动作用和创新意向。国内其他许多学者关于历史、历史转折的界定，主要着重于对历史性事变本身的阐述、挖掘和探索，得出了意义重大的理论

① 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中译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② 巴格比：《文化：历史的投影》，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9—100页。